

山河歲月話漁樵

余光中

胡蘭成先生的文集「山河歲月」，妍媸互見，是一部很不平衡的書。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多情的朋友向我力荐他的「今生今世」，說那是一部慧美雙修的奇書。當時我取來看了，覺得文筆輕靈圓潤，用字遣詞別具韻味，形容詞下得尤為脫俗，但是對於文字背後的情操與思想，則嫌其遊戲人生，名士習氣太重，與現代知識份子相去甚遠。據說文壇人士所以歡喜「今生今世」，一半是因為作者與張愛玲女士過去的一段緣份，在該書中頗多述憶。我原不是「張迷」，結果當然也沒有成為「胡迷」。

十多年後，又讀到胡先生另一部書「山河歲月」，我的感覺仍然是「憎喜參半」，也許比起「今生今世」來，憎的成份要更多一點。先說喜的一面。「山河歲月」的佳妙至少有二。第一仍然是文筆，胡蘭成先生於中國文字，鍛鍊極見功夫，句法開闔吞吐，轉折迴旋，都輕鬆自如，游刃有餘，一點不費氣力。遣詞用字方面，每個別出心裁，自鑄新語，不襲陳規。「這真是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事物條理一一清嘉，連理論與邏輯亦如月入歌扇，花承節鼓。」（一〇三頁）「中國人是喜歡在日月山川裏行走的，戰時沿途特別好風景……年青學生連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嶺，長亭短亭的走。」（二七〇頁）這樣「清嘉」而又「婉媚」的絕句，「山河歲月」之中，仰摘俯拾，真有五步一樓之感。「胡體」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却是交融，而非夾雜。國語派的人士對於這種文體，也許不很喜好，可是我認為散文的天地是廣潤無垠的，日月江河原可並行不悖，無妨留一角世界給奇花異草。

第二個優點，是作者的學問與氣度。從「山河歲月」一書，可以看出作者學兼中外，對於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民情風俗都頗有認識，且能處處與外國文化相比並論，頗多卓見。至於作者的氣度，大致說來，亦可謂胸襟恢宏，心腸仁厚，對天地間一切人物，都表示尊重與同情，字裏行間，充滿了溫暖而清明的樂觀精神。作者對於中國歷史，一往情深，對於中國文化，則是絕對信任。

可惜「山河歲月」的嚴重缺陷，也因此而來。胡先生對於中國文化，只有肯定，絕少批評。直接間接，他認定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至上美滿，冠於世界，相形之下，夷狄的文明總有所不足。這種感覺，當做一種愛國情緒來欣賞，也許是動人的，可是當做一種知性的認識來宣揚，則是容易誤人的。胡先生在書中一再強調「知性的指導」，可是在自己立論時，又擺脫不了民族情緒的束縛。本質上說來，胡先生學高於識，是一位復古的保守份子。他主張

「廢止美國杜威式的教育體質與方法，依據周禮的學校原理，並參照法國的教育制度與教學方法，重點是在育士。」又說要「恢復讀經，從小學起教以經書。五四廢經至今已五十餘年，今已是恢復的時期了。此事要先經過議論，以今世紀的新的證據與言語來把反對者的浮語陳言都掃清了，然後政府可以法規制定之。」（二八五頁）

儘管杜威也有他自身的局限，他的教育哲學仍然比較適合現代的社會。他的教育觀是創新而開放的，展望將來多於緬懷過去。和史賓塞一樣，他也認為舊式教育偏重人文而忽略科學，應予重新調整，但是他比史賓塞更進一步，主張科學的教育，應該來自各行各業的實習，而不是來自書本。這種教育毋寧更適合民主而科學的現代社會。我國正從事十大建設並提倡職業教育，杜威的教育觀接受之不暇，豈可輕言廢止？胡先生不但要廢新式教育，還要恢復讀經，而且要從小學教起，這簡直是開倒車。胡先生對教育的要求，基本上說來，仍是要造就一批舊式的讀書人。在古代，這批人叫做「士」，也可以叫做「君子」。有暇的時候，士可以寫寫文章，發發議論，有機會的時候，當然還可以做官，可是實際的建設，往往不勞他們動手。胡先生說：「士從五四運動成了新的知識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時代的青年只想做詩人，因詩人是不為職業的。也希望能當大學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來與職業聯想。也願將來做個發明家，因為科學亦如詩心的清潔……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何不像外國的列身到社會組織裏，各勤一業，殊不知中國之士向來是志在天下。」（二四六頁）胡先生理想的士不事生產，不食煙火，不與庶民為伍，其志却在天下：這種風光賴以寄託的農業時代與貴族社會，已經一去不返了。臺灣正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我們目前亟需提倡的是民主意識與科學精神，而不是思古的幽情。讀經，不妨讓少數學者帶領着相關學科的大學生甚或研究生去做，但一般國民的精力必須投入國家的重大建設。

一個健康的社會，即使前瞻不多於後顧，至少也應兩者平衡。中華民國往何處去？目前的問題應如何解決？未來的危機應如何對付？這些才是當務之急，不此之圖，而要全國學童唸唔讀經，是輕重倒置的。何況讀幾部經書，也不一定能够保證「思想純正」。章士釗，郭沫若，甚至毛澤東，沒有讀過經嗎？相反地，從韓戰沙場上來歸的一萬三千壯士，又有幾位是讀過經的呢？臺灣目前的建設，有哪幾件是根據經書而做成功的呢？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不是一直在讀經嗎？何以不能救中國呢？

我們不能否認，古代的經典是我們文化的基礎，文化界與學術界有責任加以保存，維護。但是文化也有靜態與動態兩面，一成不變地復古，只能守住一個靜態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必為後人不斷發揚甚或創新，不斷接受外來文化的挑戰而加以克服，才能產生一個動的文化。要反共，僅憑一個靜止的文化是絕對不夠的。

反共，應該是一種全民的運動，依賴一小撮「志在天下」的清談之士是不會成功的。胡先生以為培養了幾千名「革命青年」（二八六頁），就能够扭轉大局，實在天真得可愛。馬克思當初預言，未來的革命必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來發難，可是到目前為止，共產主義真正得手的幾個地區，如蘇俄，中國大陸，越南，高棉，南斯拉夫，古巴等等，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共產黨在真正的工業社會，如美國與西歐各國，却始終不能得逞。事實證明，一個健全的社會無虞共產主義的侵入。臺灣的社會，在生活水準上已遠超大陸之上，將來在充份的工業化之後，如能在權利和財富的分配上，整調得更為合理，則人民盡皆心平氣和，對於這樣的社會，共產主義是無機可乘的。

「山河歲月」的另一嚴重遺憾，是作者對日本的態度。對我這一代的中國人而言，抗戰是永難忘懷的國難，其為經驗，強烈而且慘痛，另一方面，全國軍民一心一德同仇敵愾的精

神，却又令人壯懷激烈感奮莫名。對於長我一輩的中國人，想必更其如此。可是胡先生在這件事上表現得太洒脱了，他那種避重就輕模稜兩可的語氣，凡是親歷抗戰的人都是難以接受的。他說：「抗戰的偉大乃是中國文明的偉大。彼時許多地方淪陷了，中國人却不當它是失去了，雖在淪陷區的亦沒有覺得是被征服了。中國人是能有天下，而從來亦沒有過亡天下的，其對國家的信是這樣的人世的真信。彼時總覺得戰爭是在遼遠的地方進行似的，因為中國人有一個境界非戰爭所能到……彼時是淪陷區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照樣往來，明明是仇敵，亦恩仇之外還有人與人的相見，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裏亦必還他一分禮……而戰區與大後方的人亦並不尅定日子要勝利，悲壯的話只管說，但說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國人是勝敗也不認真，和戰也不認真，淪陷區的和不像和，戰區與大後方的戰不像戰。」（二六七——二六八頁）又說：「凡是壯闊的，就能够乾淨，抗戰時期的人對於世人都有樸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難的人到處遇得着賢主人。他們其實連對於日本人也沒有恨毒，而對於美國人則的確歡喜。」（二七一——二七二頁）

這兩段話豈但是風涼話，簡直是天大的謊話！這一番話只能代表胡先生自己，因為在水深火熱的抗戰之中，他人都流汗流血，唯獨胡先生還在演「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邊亦必還他一分禮」的怪劇。也許胡先生和敵有方，「有一個境界非戰爭所能到」，可是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中，無辜的中國人民却没有那麼飄逸的「境界」。只因爲胡先生個人與敵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關係，他就可以誣蔑整個民族的神聖抗戰說的是假話，打的是假仗嗎？這麼看來，胡先生的超越與仁慈豈非自欺欺人？看來胡先生一直到今天還不甘忘情於日本，認為美國援助我們要經過日本（二八二頁），而我們未來的方針，還要與「日本印度朝鮮携手」。 （二八八頁）胡先生以前做錯了一件事，現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圖將錯就錯，妄發議

論，歪曲歷史，爲自己文過飾非，一錯再錯，豈能望人一恕再恕？

胡先生對於胡適等五四人物，始終懷有偏見。在二八〇頁上他說：「文化人的浮躁淺薄，見於他們的叫囂科學而疏隔自然法則，叫囂民主而疏隔民間之真意，叫囂進步而疏隔中國之歷史。他們以杜威的實驗哲學與科學民主云云來損傷了中國人之智慧與教育的原理。」我不懂這位胡先生有什麼資格來指摘那位胡先生。難道中國人的智慧就是與敵人在恩仇之外握手講禮嗎？難道民間之真意就是胡先生津津樂道的「新的朝廷與真命天子」（二七九頁）嗎？請問，抗戰的時候，胡適在做什麼，胡蘭成又在做什麼？事實的證明不是比大言炎炎更有力嗎？

「山河歲月」用鹿橋先生致胡蘭成伉儷的信代序。鹿橋在信上說：「知先生爲『人子』寫了書評，刊在『中國時報』上。大文尚未見到，總要四、五日後才能寄來，先此道感，當今之世能解、能評、能開導、教誨弟者更能有何人？世有伯樂方能千里馬。」當然，有什麼樣的伯樂，就有什麼樣的千里馬。難怪「未央歌」裏的抗戰，也是那麼輕飄飄的，金童玉女，似真似幻，如在霧裏。

六十四年五月廿五日於香港

我們自己學人驕傲的成果！

具有代表性水準的學術叢書！

文學評論

每冊平裝一〇〇元，精裝一三〇元

書評書目出版社精印全省各大書店均售